

跨文化的述說

葉士朋 *

一、共同語和跨文化

今天，多位同以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的代表共聚一堂，正好讓我們思考一下不同文化的溝通所存在的限制，儘管這種溝通是以同一種語言進行。

我們都知道，雖然我們說的是同一種語言，但各自擁有着不同的文化，在溝通上便出現了含糊不清的情況。

深究其因，是由於在某些情況下，文字雖然相同，但字義却截然不同；有時候，這些字義都沒被收進詞典裡。

眾所週知，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語言結構包括着許多其他的概念系統，諸如世界觀、價值觀、推理結構等系統。當某種語言“輸出”至另一種文化並成為該種文化的日常用語或溝通用語言時，上述各種系統既不會成為該門外語的學習程序的一部分，也不會完完整整地移植至該種文化之內。

一種外來的語言是會被融入另一個概念世界，它的文字從而獲得新的字義；很多時候，這些字義是多麼難以言傳、間接和微殊，即使最好的詞典也沒有收錄。對話者說着相同的文字，但他們真正想表達的意思却不一樣。有時候，從詞法層面而言，本源語根本無法與新語境的力量抗衡，這時，便會出現所謂土語（crioulos）和混雜語（pidgin），這類語言以完全自主的方式把語言的意義（語義）和形式（語音、句法）結合起來。

除了語言區別已十分明顯的土語外，使用相同語言而仍無法進行準確對話的關鍵，在於相互的不瞭解並不突顯。表面上，各人所說的是一致的，但事實上，却在自說自話。

在一些匯集使用相同語言者的組織內，無論是由良好的意願，或由不那麼崇高的意圖所孕育出來的巧妙程式，通過對語言團結的潤飾及其促成的相互瞭解，掩藏了久缺溝通的事實。共同語支撐着一種團結、歷史、共同命運和共同利益的陳述。利之所至時，我們便會看清這些利益並不那麼一致，這是自然而然和無可避免的。

* 澳門大學法學院指導教授、里斯本大學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全國委員會主席

所以，一套健康和實在的共同語政策的起步點，應該是對各種特殊性作出的嚴謹分析。分析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很多時候，這些特殊性未必能精確無誤地反映出有關國家的種種實況，因為，事實存在着多文化國家）、分析為所用語言制定的語言政策的特殊性，以及潛在利益的特殊性等等。

唯有認清各方立場的特殊之處，才能定出一套一致的（或僅是部分一致的）、多元化而通用的語言和文化政策。

談到語言，便應該談談所有關於跨文化的研究，這也是我們現在要探討的課題。

二、發現、交匯、對話和其他的友好方式

跨文化現象見於日常生活之中。

一方面，隨着溝通方式的進步，無論是實際的或是潛在的，現今世界已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整體化，各種文化的接觸也日趨頻繁。

然而，主要的是，第一世界已不像以往般自給自足和以自我為中心，因此，對有異於本身文化的不同文化有了較強烈的感應。

基本上有兩大原因：第一，西方嘗試慷慨地把其生活方式、政治法律制度、經濟模式等輸往歐洲以外的文化世界取得了成功，當然這成功是值得商榷的。

此外，這種對無可抑壓的文化多元性的認知，亦基於因應不同的外來移民在第一世界內體驗文化差異所取得的直接經驗。歐洲人和美國人都不必飄洋過海去尋覓文化迥異於他們自身文化的人。

或許並不偶然的是，在人類學和社會學裏面，理論性的反思已開始極為重視一切文化表現的固有特點，從而建立出一種並不抽離西方文化最基本價值的文化相對主義。

這一切發生在歐洲熱烈地慶祝向外擴張五百週年的時候。這史實的稱謂必須按新的氣候作出改變。面對文化的非集中化，「發現」一詞涉及一種世界歷史以歐洲為中心的觀念，已不為人所接受，儘管這並不代表要否定歐洲人當時曾發現其他的人和地的事實。然而，由於當時的歐洲文化儼如「大文化」、「大文明」，「發現」一詞喻示着「大文明」發現了另一半身處不文明和無文化狀態的人類。尤其自十九世紀開始，歐洲的帝國主義從沒間斷地用盡不同的文字去重覆上面的論述。換而言之，不為人所接受的並不是某種本土文化（歐洲文化）發現了其他同樣是本土的文化，也不是某些土著（生於某地的人）發現了另一些土著的說法；引起反應的是指當時那些非歐洲的民族是被「大文化」所發現（接觸），那些土著是被「非土著」、「非本地人」或「認識世界者」所訪尋。

「發現」這一概念把歐洲人置於世界歷史中的主動、剛強和啟蒙一方，把非歐洲人放到一個被動、忍受和對象的地位，放到歷史中「女性」的一方，並延續這種對非歐洲文化性質慣常且非單純因無知而作出的隱喻，視這些文化為女性化的（被動、非理性的）（印度），忍受 / 病態的（土耳其）、沉睡的（中國）。

取「發現」而代之的是「交匯」。就本身概念而言，「交匯」屬於一個中立的概念，並無說明交匯是和平的還是爭戰的，是平等的還是不平等的，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更不談及交匯中誰勝誰負，得失又是些甚麼。交匯喻示了平等、對等的概念，並指示出如何對歐洲人與非歐洲人之間友好交往的歷史進行取悅人心的解讀，從而集合不同文化、取長補短。在接觸中出現的不平等、衝突，且往往是粗野的特點不知不覺地消弭於無形。評價歷史時，漸漸加入了「文化對話」和「世界開放」等具有積極意義的說法。這暗示着，但主要是試圖隱藏這種表達「交匯」的新程式其實是一種比以往的更能蠱惑人心的修飾手法。

因此，歷史和人類學思維一直抗拒這種取悅人心的修飾方法，而堅持對「交匯」的方式和結果進行嚴謹和合理的研究。

何謂對歐洲拓殖進行嚴謹和合理的研究？

三、嚴謹和合理

「嚴謹」和「合理」兩詞中，前者是決定性的元素，因為，合理在這裡解作敘述事實的正確、恰當或合適的方法，正好能融入我們即將討論的嚴謹這一概念之中。

嚴謹的研究是指對「發現」、「交匯」等知識在認識論層面出現的困難，以及對因此而帶出的種種問題進行理智的研究。

這些困難最早是出現於所採用史料的性質。許多「被遇見」的文化都是口述的，除了歐洲的轉述外，並無其他歷史作為依據。另一些文化則有文字的記載，但記錄方式却是多樣化的，某部分仍然是由不同的文章組成的間接式敘述，其目的並非像記載「大發現和征服」事業的編年史般，直接地留下條理分明而詞藻華麗的歷史憑證，例如一些行政文件、訴訟材料（幾乎全屬辯護詞）或由殖民地長官指示進行的描述（歷史、地理、典章制度等）。在這些文件中，非歐洲人的土著並非為編寫歷史，通常不談及其論說或語言的理性面，他們的言語是由殖民者無知的推論模式構成。正如一些人所共知的研究所指，這些模式把過往世界秩序的結構改變，阻礙了原本可能對整個本源文化取向作出的論述。因此，閱讀上述史料時，必須嚴謹地減去歐洲推論模式的障蔽，務求找出原件的脆弱、欠缺條理和不連貫之處。另一方面，一些非歐洲民族早已擁有且繼續擁有媲美歐洲甚至較歐洲更為豐富的文學，例如印度和中國，然而，在歐洲的歷史或歷史人類學推論中，她們的史料並沒有得到類似對歐洲史料所作的整理。有時，由於外語帶來的困難，史料更為人所忽略，儘管這樣的解釋並不為人接受，正如不懂德語而要編寫與德國交往的歷史一樣。另一些史料則往往以人類學為基礎加以考量，這種不適用於歐洲史料的考量方法形成一種觀點的二元性，換言之，對於非歐洲史料，是作為被本土文化扭曲的文章去研究，對於歐洲史料而言，則作為一些中立和在文化上並無歪曲的論說研究。

尋回這些作為歷史源頭的失落聲音，正是「特稱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歷史學和人類學學派的目標，這些研究試圖重新評價上述歷史根源。這些根源能表達出一種按歷史上的主導組別（富有、文化、城鎮、男性、白人、異性愛）而對各組別冠以特稱的觀點。

在嚴謹處理史料方面，另一個方法學流派強調殖民知識是殖民事業本身的產物。

不但因為歷史學家、人類學家或人種法學家正致力研究潛藏於殖民主義或後殖民主義的事宜，更因為殖民事業本身——特別在政治或行政層面——造就出一些能提供有關殖民地知識的原材料的學術研究對象和利益。經典例子有大不列顛的殖民學問，其與殖民化引發出的事物、課題和利益緊密相連，尤以印度的例子為甚。

研究歐洲擴張史的嚴謹性對構成相關論說的陳述理念和格調有頗為嚴格的要求。我們往往不察覺我們賴以陳述歷史的許多範疇在文化上是歐洲特有的，許多概念如國家、法律、藝術、宗教、文學等均與歐洲文化（有時僅限於當代歐洲文化）相連，當被用以描述其他文化時，並無多大意義。為人所熟悉的圍繞着中國的“禮”有無宗教性質的討論，成為了應用超文化詮釋的結果的明證。時間、空間的概念，以至解釋人類行為的方法亦面對同樣的限制。

最後，對歷史背景的分析也應嚴謹。歐洲歷史編纂學在描述歐洲與非歐洲世界關係史時，通常只借助歐洲的歷史背景分析，例如中世紀或現代、三十年戰爭或首次工業化等，都是與其他的世界歷史事件無太大關係的歷史背景。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社會學或政治學方面，常以專屬第一世界社會的社會或政治模式去理順一些非歐洲世界的資料。一種較嚴謹的觀點是，必須尋求合適的、超脫於歐洲和北美歷史的背景分析。

嚴謹意即要求對跨文化關係的極度複雜性進行忠實的詮釋。由此至終，對這關係都有着兩種判讀方法，各自有其對所發生事情的獨有詮釋，各人均憑本身的觀察、評價和想象去看他人。本身的溝通經驗逐漸把上述判讀方法加以琢磨，因而慢慢推翻某些原有觀點，隨後，發展出各不相同的注意點，這些注意點又引發出相互的評價。任何一方的觀點都不斷有變，但互易的特殊性却經常存在。文化對話的概念有時不及自說自話的文化來得實際，在大多數情況下，互相理解是建基於誤解的一種表象，正是這些跨文化的誤解容許現有溝通的存在。

綜上所述，沒有任何巧妙的臆想或程式能減少跨文化接觸所固有的矛盾和謬誤。

四、葡語和多元性

且讓我們談回葡語的問題。

今天，葡語的作用是甚麼？

在一個日益仰仗溝通而建立的世界，「語言問題」所發揮的作用也越顯重要，勾勒出極為繁複的掌握語言或抵禦吸納的策略。這些策略的重要性迫使各個語言集團堅持本身的凝聚和統一、消除個體主義、劃一正字法。

不幸的是，如要共同語更趨普及，個人空間必須不斷縮小。在每個語言集團中，大量源自同一軀幹的個人化獨特見解都趨向於成為一種具地方色彩的世界語，既無性格，也欠靈魂。無可避免的世界文化統合趨向，勢必犧牲語言和文化的多元性。

面對現存的無數挑戰，事情開始變得更加奧妙。由葡語系統諸語言談到拉丁語系統諸語言，在贊比亞（Zambézia）、巴塔哥尼亞（Patagónia）、卡斯蒂羅阿維利亞（Castelo-a-Velha）、利古利亞（Ligúria）、普羅旺斯（Provença）和波多黎各（Porto Rico）之間如何能找出本質上相同之處呢，如今，在一個單純的拉丁語言根源周圍統合和喪失特性的威脅變得更大。一如所發生的，在較傳統的語言文化社會內（在葡語社會亦然），這種特性的喪失永遠不會是均等的，總是有人付出較多，有人獲益較大。

因此，比其他語言空間（如英語或法語）有更佳文化平衡的葡語空間，應摒棄對一致性和團結的文飾。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甚麼比人們常說的「我的祖國就是我的語言」更為虛假和危險，因為，在葡語之中共存着且應繼續共存着許許多多的「祖國」，比國家還要多的祖國。「一種語言，一個祖國」是一種帝國主義的理念，無論自視為這樣一個共同祖國的國家為何。一旦摒棄了對一致性的文飾，便能認清葡語世界中的差異和領會箇中的複雜性。總是文化上的複雜性；各人對他人的觀感的複雜性；個人在整體中所擔當角色的複雜性；在葡語世界中交流文化及個人在交流中所具形象的複雜性；還有共同語政策在面對土語政策時出現的語言複雜性，當然，這些複雜性必然是矛盾的：共同語教育的推廣即扼殺土語；此外，更有葡語教授的複雜性，在米尼奧、盧安達或澳門的中國人社群教授葡語所採用的方式亦有所不同；正字法政策的複雜性，或許這項政策的普及性和必須性不必過份極端，從而容許存在區域性的可變空間。

與我們之間所想象的剛好相反，複雜性和變異是豐富與進步，在生物學或文化角度亦然。似乎上帝以其智慧在巴別塔下分立各種語言並非是對罪孽的懲罰，而是對勇毅和創造力的犒賞。

所以，葡語世界應擺脫獨一語言的枯燥乏味，而與共同舞台上千百種語言齊興奮共和鳴，這樣葡語則可分布於這個舞台上的許多角落。

